

在激荡中发展并呈现光芒

□李朝全

表现时代发展,呼应时代发展脉搏,关注国计民生,是近五年来报告文学最鲜明的特色或亮色。一批作品聚焦讲述中国新故事,刻画时代新人,以文学方式解读和阐释中国梦,成为五年来报告文学这种时代文体的强音。

五年来,报告文学变化很大,中国作协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培植扶持报告文学新人。在江苏华西村、沙家浜、河南鲁山、山东济南和浙江南浔接连召开了五届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会,每届平均约200名作者与会,通过短期集中的培训交流,激发起了一大批作者参与报告文学创作的热情。鲁迅文学院开办了有55名学员参加的鲁二四报告文学作家高研班,今年9月还要办一期非虚构作家班。全国各省市陆续成立了数十个报告文学学会。这些都是为报告文学培养后续力量,使报告文学作者队伍呈现出崭新气象。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在报告文学的创作理念方面。2010年非虚构创作这一概念的提出,客观上对报告文学创作理念起到了反拨或者激活、刷新的作用,一批受到广泛关注的非虚构作品让报告文学作家看到了自身不足,同时也看到了非虚构的缺陷。在非虚构创作潮风之际,报告文学界也进行了反思,并且努力从非虚构的漫溢中汲取有益的滋养,逐步澄清了创作中的一些理论性课题,刷新了创作观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均有一两部现象级的报告文学作品发表或出版。如李春雷的《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王树增的《抗日战争》、王宏甲的《塘约道路》等,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因为《塘约道路》,全国众多的省市县纷纷前往塘约脱贫致富共同富裕的经,作品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界。这提示我们:深刻关注现实,呼应时代发展脉搏的报告文学的影响力一直都在,而且非常巨大,定会受到老百姓和全社会的认可。

亮色鲜明: 抒写时代主题 表现中国精神

回顾这五年报告文学创作,确实出现了新格局新特点,也有很多新变。其中最重要的创作内容是表现时代发展,呼应时代发展脉搏,关注国计民生的主题,这是近五年来报告文学最鲜明的特色或亮色。一批作品聚焦讲述中国新故事,刻画时代新人,以文学方式解读和阐释中国梦,成为五年来报告文学这种时代文体的强音。

在举全国之力决胜小康关键阶段,表现脱贫攻坚内容成为报告文学作家着力的一大重点。去年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龙宁英的《逐梦——湘西扶贫纪事》,描写的是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过并提出“精准扶贫”的十八洞村为代表的湘西大地开展扶贫攻坚战的壮

丽场景。《塘约道路》关注贫困地区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蹚出一条农村变革图强新路,具有标本示范的价值。蒋巍的《这里没有地平线》刻画文朝荣这位时代先进楷模,表现贵州省脱贫攻坚、决胜小康社会的艰难历程。纪建红的《乡村国是》则是全景式反映全国各地广泛开展扶贫脱贫攻坚、实现共同富裕梦想的作品。杨黎光将创作的重心转移到对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探索与思考,推出了追寻中国现代化的脚印三部曲,特别是他的《横琴——对一个新三十年改革样本的五年观察与分析》通过解剖个案,思考探索改革开放未来走向,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张胜友、徐锋的《百年潮·中国梦》是对中国人民百年伟梦的思辨性表达,产生了很大反响。

在践行新的发展理念中,绿色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五年来涌现出一批报告文学反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美丽中国、美丽乡村建设主题。何建明的《那山 那水》以浙北小山村余村和安吉县的发展为例,点面结合,揭示乡村绿色发展、生态立县的新路径,正面表现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李青松的《徽甘菊——外来物种入侵中国》关注外来物种危害,提出应对措施。陈启文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大河上下——黄河的命运》、哲夫的《水土中国》、裔兆宏的《美丽中国样本》、秦岭的《在水一方》、李春雷的《水中国》等关注水资源保护、水利建设等以水为主题的作品,均为生态报告文学的有机组成。

反映创新创造主题的作品也是近五年报告文学的突出亮色。反映智能人研发历程、揭示即将到来的智能时代的有王鸿鹏、马娜的《中国机器人》,反映航天工程进展的有陈新的《嫦娥揽月》,反映海洋深潜事业前沿成就的有许晨的《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反映超级计算机事业的有龚盛辉、曾凡解的《决战崛起——中国超算强国之路》,描写高铁发展的有王雄的《中国速度》等等。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占报告文学很大分量的一部分作品就是英雄叙事。当下的英雄叙事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这些英雄人物更多的开始走向“世俗化”、凡人化。这些英雄,包括“感动中国”人物、全国道德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更多的是从普通人之中涌现出来。关于英雄的报告文学更多凸显凡人身上的英雄性、英雄情结、英雄品格,同时注重表现英雄身上的凡人性、平民化。这种创作理念包含了这样的含义:所有的英雄首先都是普通人,都是从普通人中间诞生的,只是因为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我们时代发展前进的方向,集中而典

型地体现了时代主流的价值观,因此而被命名为英雄。如何建明塑造天津大爆炸救火英烈群像的《爆炸现场》,黄传会刻画以身殉职的生死一甲子》讲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彰显兵团人身上伟大的爱国卫国、建设国家的奉献精神。朱晓军的《快递中国》《“乌坎事件”调查》分别关注当下中国两大热点:迅猛发展的物流快递和基层政权建设,启人深思。赵德发的《白老虎——中国大蒜行业内幕揭秘》聚焦大蒜价格大起大落的社会焦点,针砭时弊,洞察人心。韩生学的《中国失独家庭调查》《中国人口安全调查——“全面二胎”周年回眸》应和全面二胎时代,关注人口安全,意义重大。

所有这些关于当下时代发展主流、主旋律的纪实书写与叙事,都是聚焦现实讲述中国新故事谱就的文学新篇章。这是五年来报告文学最鲜明的一个特色。

彰显活力:多维度多向度开掘

抗战题材创作取得突破,成就突出。在抗战胜利70周年前后,涌现出一批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优秀之作,包括《抗日战争》《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此外,张雅文的《与魔鬼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背景下,塑造了各国的一些反战英雄形象。冯雪松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踏寻发现已逐渐隐入历史深处的重要的战地记者方大曾。丁晓平的《大国博弈·1945:另一半二战》和王龙的《刺刀书写的谎言》别出心裁,分别聚焦二战期间的大国外交战和侵华日军中的作家文人等,具有独特的价值。这些作品视野开阔,人物饱满立体,显示出抗战题材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向历史和民族民俗文化等纵深进行开掘,出现了一批好作品。如伊蒙红木反映佤族历史文化习俗的调查报告《最后的秘境》,李延国、李庆华思考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够赢得民心的长篇纪实《根据地》,铁路、徐锦庚寻根溯源讲述一部《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的《国家记忆》,铁路、纪建红反映解放前老党员保持革命本色的《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等,都是历史题材纪实中可圈可点之作。

回望往事和昔日人生的国民记忆、平民自述类纪实作品大量出现,是近年来报告文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些作品叙事的主体都是普通百姓,他们追忆和记述自己过去人生历程、家族记忆的作品引起了较大反响。这些“草根叙事”和普通国民记忆,容易激发起有类似经历或感受的读者们的情感共鸣,这是近年来一个新颖的创作取向。

现实题材和现实主义创作亦频频有佳作发表。舒辉波的纪实《梦想是生命里的光》讲述身

处各种逆境的少年自强不息的成长故事,能给人以激励和振奋。丰收的《西长城——新疆兵团一甲子》讲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彰显兵团人身上伟大的爱国卫国、建设国家的奉献精神。朱晓军的《快递中国》《“乌坎事件”调查》分别关注当下中国两大热点:迅猛发展的物流快递和基层政权建设,启人深思。赵德发的《白老虎——中国大蒜行业内幕揭秘》聚焦大蒜价格大起大落的社会焦点,针砭时弊,洞察人心。韩生学的《中国失独家庭调查》《中国人口安全调查——“全面二胎”周年回眸》应和全面二胎时代,关注人口安全,意义重大。

非虚构的创作方式及手法对小说创作也产生了影响,这也是近五年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如孙惠芬的长篇小说《寻找张展》几乎完全采用田野调查的方式,寻找一个失踪的青年张展,董宏猷的长篇小说《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时,花费数年时间走南闯北,寻找各式各样的各个国家或民族的、各种年龄段的孩子,了解和探究他们心目中的中国。越来越多的小说家都有这样向报告文学借鉴吸纳优长的倾向。特别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大批作家走向田野走进民间,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采集创作素材及资源。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非虚构创作也在主动借鉴吸纳小说虚构文体的优长,运用丰富的想象、生动的情节、精巧的构思、精致的结构和精美而富于特色的语言来进行创作,出现了一批艺术性和文本价值较高的优秀作品。譬如阿来的《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丁燕的《低天空——珠三角女工的痛与爱》、张敬寰的《吸血的血透——揭开医院过度医疗内幕》、紫金的《泣血长城》、周芳的《重症监护室》、丁一鹤的《东方白帽子军团》等。报告文学与小说之间的相互融汇贯通、取长补短、互促共长,是文学创作发展的必然趋势。

总体来说,五年来报告文学成就喜人,出现了很多很好的变化和气象,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报告文学参与现实的力量有所削弱,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受到一定程度的忽视,邀约式“被动写作”过多,如何变被动写作为主动写作,是广大报告文学作家直面的一个严峻课题。报告文学还须增强战斗性、批判性,对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报告文学的艺术性和理论建构亦应引起高度重视。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只有精美的艺术作品,才能赢得广大读者长久的喜爱。而理论上的建设对报告文学作家更是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

为绿色发展助力

□李青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其实,这句话也是一句文学语言,是对绿色发展的诗意描述。何谓绿色发展?我的理解,绿色发展就是以效率、和谐、可持续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绿色发展对任性的蛮横的发展说不,对掠夺性的、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的发展说“不”。绿色发展是在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约束条件下,将生态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发展理念和模式。

“文脉与国脉相牵,文运与国运相连”。回眸和梳理五年来的报告文学创作,我们不难发现,此间,生态报告文学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生态报告文学是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报告文学。生态报告文学把自然作为抒写对象,主张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强调人对自然的尊重,强调人的责任与担当。

生态报告文学在记录中国绿色发展的进程中,或许还是治理雾霾、治理江河污染、治理沙漠,天然林禁伐等重大生态建设工程和重大生态事件的另一种形式的档案和备忘录。生态问题催生了生态报告文学,但生态报告文学的使命却是为了消除生态问题。虽然生态报告文学不能直接改变生态状况,而改变人们的思维和观念,甚至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则是完全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报告文学的作用似乎又是巨大的。

生态问题的本质是人的问题。生态报告文学通过独特的视角呈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生态问题中人的问题。或许,人的最大问题就是逐渐丢失了人性。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的行为开始变得理智起来,随着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为代表的一批生态建设工程的实施,中国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发生了重要变化。乱砍滥伐和乱捕滥猎已经成为可耻的事情,没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非法伐木和猎杀野生动物了。由于工作关系,我有幸参与和见证了这些重大生态工程的建设过程,而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使命和责任要求我必须把这一切记录下来。

于是,这些年相继创作了报告文学《共和国:退耕还林》《林区与林区人》《一种精神》《乌梁素海》《油茶时代》《徽甘菊》《老号森铁》《贡貂》《首草有约》《鸟道》《文冠果》等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生态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不是管理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深层的文化问题。因此,生态报告文学除了呈现绿色发展中的困惑与无奈、阵痛和艰难、失望与绝望,更要呈现绿色发展中的勇气和力量、抗争与奋进、希望与幸福。这就要求生态报告文学必须回到本源去——进入人的内心。我们心中的道德律所起的作用,我们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我们对于发展的巅峰到底是什么的重新审视和思考,是生态报告文学万万不能忽略的。生态报告文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它除了反映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是怎样的,同时,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它还要反映人与自然的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绿色发展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发展;我们心底的那个绿色中国梦是什么样的。

我最近在创作《塞罕坝时间》时,就做了一点探索和尝试。行文用“反问推进法”——塞罕坝,塞罕坝,塞罕坝是啥意思?这种不断的追问,在文中出现了十几处,强化“塞罕坝”三个字的分量。塞罕坝意味着什么?塞罕坝代表什么?其实,塞罕坝就是绿水青山,塞罕坝就是金山银山,塞罕坝就是我们心底的绿色中国梦。这个梦并非虚幻缥缈,并非无根无蒂,这个梦是真实的,就在眼前。

人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们是不顾一切地奔向毁灭,还是诗意地踱向未来?这个问题不需要我们每个人做出回答,却需要每个人都进行思考。

从故事走向话语

□张志强

文化崛起的时代是报告文学在中国文坛异彩纷呈的背景,“讲好中国故事”又为报告文学创作的实践提供了积极的推动力,高品质的、耐读的、有文化品位的报告文学作品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报告文学在创作实践上已经发生了一些认识上的变化,比如,传统报告文学所强调的“三性”问题,在今天的创作实践中已经变异。

“三性”,即报告文学的新闻性、论说性、文学性。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指的是什么?是要代替新闻报道还是站在事件外部的重述?这与其他形式的文学创作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作品中叙事人不断的现身发声、过多的论说与评价已经使得作品受到了严重损伤,我们还能强调其道德的、伦理的、哲学的评价吗?报告文学“文学性”的特征也正在受到冲击。报告文学当然要有“文学性”,但创作的实践可不是这么回答的,某些作品已经完全消解了文学叙事的审美品格,以更加客观的、冷峻的叙事方式在呈现事件与人物。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些作品,如《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锌皮娃娃兵》等作品都是为了“口述实录”的方式记录事件当事人的经历与苦难。为了客观与真实,作家几乎就是一个诚实的、机械的声音记录者,并无个性的独立的文学声音的出现,正是因此而让人感到了一种切肤的震撼与惊讶。作家在这里追求的并非是“文学性”,而是追踪本相与真实。现代报告文学创作中,叙事者有意隐藏身份而“粗糙地”、“原始地”呈现事件的方式被某些作家所接受与运用。客观的叙事效果要远比哭天抹泪、跪地长叹的方式带来的张力要大。

对于报告文学的讨论应当从故事层面回到话语方略。查特曼在他的《故事与话语》中提出:“故事是叙事表达之内容,而话语是该表达之形式。”也就是说,我们

讨论报告文学的真假、虚构与非虚构等等问题是在“故事”的范围内考证与自说自话。按照普罗普在《故事形态学》中的分析,故事是有限的、可数的,在看似丰富多彩的故事表象背后,其实是一些简单而明晰的世界,无非是真假、善恶、爱恨、情仇、生死、本能等。但是,讲述这些故事与事件的方式则千差万别,也就是话语形式却是多变的。同样的故事,在不同人的叙述下却有着惊人的不同。因此,探讨讲故事的方式,也就是话语(形式)方式要比故事(内容)重要得多,但是,报告文学创作的话题却总是把注意力和精力用在故事而非话语上。

这就回到了问题的本源:报告文学是否有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是否具有一条鸿沟裂隙的存在。报告文学在文学性、“真实性”和新闻特质等方面是否真的具有某种不可侵犯的势力范围?这些问题涉及到报告文学存在与发展的大计方针,因此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首先是叙事身份的问题。

报告文学创作与其他的文学体裁一样具有叙事文学的基本特征,它追求的是真实、真相、真理,只是表达的方式略有区别而已,甚至在某些时候,这种区别都是没有的。有些人认为“非虚构”的报告文学就绝对不能有虚构的成分,但是,“非虚构”的叙事真的可以“绝对”脱离虚构的方式吗?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当一个作家以“真实”的状态去叙述某个具有是非问题的事件时,他真的能够保持“真实”的叙述姿态吗?要知道,在叙事中,只要作家开口他就是有立场的,他所谓的“真实”与“客观”仅仅是站在他的角度和立场上得出的,而如果稍稍换一个视角、站在反对者的立场上,那么,叙事者的所谓真相便是虚妄,甚至是虚假的,他的真实又如何站得住脚。



因此,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只是站在一定立场从一定身份出发的真实。从通常意义上来讲,我们自然会表达“真善美”,但所有的价值判断,尤其是道德判断都是相对的,是具有身份性的。在“时代报告”的文学中,提倡“歌颂”还是“揭露”更具有相对性。世界其实是杂性的,虽然有价值判断与道德规范,却要看判断的权利在谁手上。也就是说,谁来说,决定了说的方式、说的结论,以及说的美丑。叙事身份决定了叙事的指向。

第二,呈现与讲述的问题。

单一的叙述带来的是单一的视角与声音,是固定的受限的视域,因此得出的结论与效果也是单一的带着偏见的。对于一个“犯了错误的好干部”我们怎么去描写?对于一个“有缺点的英雄”如何表现?在单一的视角下,我们的叙述会停留在极端的好与坏的判断、简单的善与恶的评价中,单一的叙述给我们带来的是成见与符号化的结论。

当我们的这个时代提倡正面歌颂与“正能量”写作而使作家忘记了追求真理与真相的“初心”时,我们会变得固执己见,我们会失去冷静的判断。但是,当我们只以歌唱者的姿态去描写事件时,我们就会自然地排斥那些矛盾与阴暗的存在,有时我们看待对象的错误都是带着爱怜的心态,把丑陋装扮成可爱,把污言秽语粉饰成亲民,把霸道匪气说成是自信大度,这就失去了作家们念念不忘的“真实”和对真理的追求。

如此,报告文学创作的本质是“摆事实”,无关乎“讲道理”,甚至是有时拒绝“讲理”的。作家所讲述的事实就是一种倾向,就是在“讲道理”。因此,作家讲什么本身就已经透露了他的真实想法,为什么要展现这一个“事实”,而不去讲其他的“事实”,为什么这样讲而不是那样讲,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一个作家没有可能把全部的事实都呈现出来,这就使他有选择了事件的自

由,而这个自由就是作家的价值取向。

第三,叙事时间。

时间指的是故事和话语两个层面的问题。这里依然存在着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两个具体的时间系统,是报告文学较少涉及的技术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叙述都是事后的追述,无论是报道刚刚发生的事件,还是报告100年前的某个事件,都是在事件发生后的补述。这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现实”是指多长时间跨度的“现实”?一个月前发生的事件就要比100年前的那个时间更“现实”吗?无论事件的跨度多长,作家所要做的是“复元”现场,从相对客观的视角恢复到事件的“现实”中去,因此,与事件保持的时间距离是没有意义的。今天的“现实”10年、20年之后都是“非现实”。因此,从本质上说,故事时间的长度并不重要,话语的时间长度才具有叙事意义。

时间涉及到三个特性,一是时间的顺序,二是时间的跨度,三是时间的频率。报告文学创作追求的是“真实”,因而对于时序的要求就过于苛刻,乃至早晨、中午、晚上的次序从未出现过变更。但事实上,我们的话语有时并非完全以此为依据,甚至“语无伦次”地讲述,这使得报告文学严格恪守的时间“真实性”受到了某种嘲弄——谁说一定要开始、中段、结尾地去写?谁说一定要从左至右地读?故事时间指的是报告文学所描述的时间系统,而话语却未必。

今天的中国报告文学需要探讨的领域等待着扩展与深化,不能仅停留在真假是非等那些被讨论过无数次,并且很少出现新意的议题上,也就是我们需要稍稍离开报告文学的“故事”领域,而要去更多的去探讨报告文学的“话语”系统,也即形式问题。这是基本观念的建立问题。形式与手段是提高报告文学创作品质的根本问题。